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49

中共党史出版社

D239
16

88889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九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年·北京

(京)新登字 071 号

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九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宫门前甲 10 号

电话:(01)2581570 传真:(01)258153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7.5 印张 150 千字

199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023-668-4/K · 621

定 价:4.50 元

DH94/14

目 录

回 忆 录

- 我的革命历程 李 强 (1)
追忆与毛泽民同志共同战斗的岁月 高登榜 (30)
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
阴谋的日子里 汪东兴 (56)

人 物 介 绍

- 李锡九传略 刘金田 李月兰 (83)
“文化大革命”中的李富春 陈志凌 (102)

专 题 资 料

- 广东共产党人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过程中的历史贡献 周兴樑 (114)

《甲申三百年祭》的首次发表与中国

- 共产党的延安整风 刘昌亮 (134)
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郑雅茹 柳建辉 (141)
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前期的
“抓革命、促生产” 安建设 (178)

史料研究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

- 状况的基本分析 王健英 (194)

民国史·现代史

- 我所了解的张冲与斯大林的一次会见 ... 西门宗华 (214)

小资料

毛泽东主席率中共中央抵达北平的第

- 一站 柳林溪 (217)

我的革命历程

李 强

我是江苏常熟人，1905年生，原名曾培洪，字幼范。我从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算起，至今已近69年。69年中，我的人生之路始终与中国革命之路紧密相联。

五卅运动爆发时，我是上海东华大学土木科的一名青年学生。那时，国家的危亡，民族的灾难，都像山一样压在我们心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而五四运动所点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烈火，仍在我们青年人的心头燃烧。尤其是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不少青年因而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5月，在中华大学担任中文教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上海执行部负责人叶楚傖派人来找我谈了一次话。其后他介绍我加入了国民党，同时入党的还有张超、陈德华。当时，著名的上海大学离我们学校不远，该校在校长于右任的支持下，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十分活跃，叶楚傖、邵力子等都经常在那里讲演，我也曾听过他们的讲演，

给我很大的启发与鼓舞。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病逝，举国震惊，各地纷纷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上海各界人士也在城隍庙附近的九亩地新舞台戏院举行了追悼会，我也参加了。会上，国民党左派代表表示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持贯彻三大政策；右派代表却无理取闹，从中捣乱。主持大会的何香凝看到会场秩序混乱，就拿起手铃拼命地摇，让大家保持肃静。何香凝讲的是一口广东话，大家根本听不懂；尽管有人翻译，也无济于事，只好宣布散会。在人还没有走完时，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最早成员、团中央执行委员俞秀松跳到台上，大声宣讲要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持国民革命，但因当时会场秩序较乱，结果招致了一些人的嘘闹声。

在这些活动中，我们逐步认清了国民党右派的真面目。

1925年4月间，上海日本纱厂内外棉七厂的一名中国工人被日本监工活活打死。10多天后，工友们在共产党的教育、影响下，在附近大学青年学生的支持下，推举了代表向厂方提出抗议和要求。日方不但拒不接受，反而借口没有原料关闭了厂门。数百名愤怒的工人在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的带领下，冲进了工厂。日本大班元木川村竟向顾正红连开四枪，顾正红当场身亡，同时受伤的还有10余人。这件惨案就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

在共产党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负责人恽代英的直接领导下，上海各大学都积极行动起来，抗议帝国主

义的暴行，救援受伤与贫困的工人。我正是在这时加入了学生联合会，并结识了恽代英、陆定一老同志。5月30日那天，不少学生涌上街头，三五成群在南京路上演说。演说吸引了无以计数的群众，群情激奋，交通为之堵塞。外国租界当局恼羞成怒，派出大批武装军警，殴打、驱赶群众，后又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拘捕150多人。南京路一时血迹斑斑，惨不忍睹。

五卅惨案震惊了中外。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动员、组织各界群众，联合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在恽代英的领导下，通过学生联合会进行了各种工作。一个星期后，上海大学的学生代表郭伯和约我谈话，并把我带到共青团负责人贺昌那里，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共青团。我当即表示愿意。这样，我就在6月初加入了共青团，并经常出席团的会议。在上海学联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成立的“学生军事委员会”中，我被推选为军需委员。

正是在五卅运动的高潮中，我开始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逐步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此后，我被共青团上海地委书记贺昌派到曹家渡从事青年工人运动工作；1925年7月，我由中共曹家渡支部联合会书记陈竹山介绍转为共产党员；11月，我被任命为曹家渡青年团的书记；12月，又被增补为团上海地委候补委员。

1926年初，组织上决定调我任上海浦东青年团的书记。浦东的特点是修船厂多而且集中，码头工人占很大的比重。为了加强与工人的联系，我们办了一个贫民医院、一

所贫民学校，一面帮助工人解决困难，一面补习文化，提高文化素质与政治觉悟。

尽管浦东的情况非常复杂，条件艰苦，但是我们努力工作，热情很高。当时的团中央总书记、组织部长任弼时来了解情况时，曾给我们的工作以很高的评价。6月，组织上通知让我去吴淞，任吴淞区的青年团的书记。7月，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又把我调了回来，原来，当时北伐军已进入江西，中共上海区委正在准备武装起义，他们要我研制火炸药，为暴动做准备。

于是，我到化工仪器公司买来石碳酸、硝酸和硫酸等，把这些材料按一定的比例混合，自制成黄色炸药。原来还打算做手榴弹，但因条件不具备，只得放弃计划。然而我们还是通过别的方法，弄到了不少手榴弹。

暴动前夕，罗亦农让我回常熟，发展党的组织。仅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我就发展了王耕英、曾雍孙、邹逸中等人入党，成立了中共常熟特别支部，属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直接领导。1927年2月，我被任命为特别支部的书记。

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武装起义都因准备不足、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宣告失败。但1927年3月21日举行的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获得成功。工人武装经过30个小时的激战，终于打垮了盘踞在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但我在起义前为之试制的炸药、起爆药，以及购置的手榴弹全用上了。

起义胜利后，我到上海向罗亦农汇报了常熟的情况，罗亦农指示我继续发展党员，扩大组织，我深受鼓舞。

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六十三团进驻常熟，陈诚为团长。当时邹逸中任国民党常熟县党部的主任委员，他同时也是共产党员。我们的工作大都通过他出面去做。我们四处贴标语，做宣传，发动反封建的斗争，成立了农民协会。后又决定成立“常熟县临时行政委员会”，由地方开明士绅钱南山为主席，我为委员。

但是，革命的发展触到了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其它反动分子的痛处，他们互相勾结，支持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4月12日到4月15日，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杀害的有300余人，被捕的500多人，另有5000余人失踪。在白色恐怖下，中共上海区委为了保存力量，决定结束罢工，转入地下斗争。此时，我接到组织通知从常熟回到上海。

我先是找到顾顺章，他那时是中共中央特别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又是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的局长。他告诉我目前的形势严峻，中央决定迁往武汉，他马上要随中央机关转移。我送他上船后，又去找罗亦农。罗亦农交代我把中央紧急转移后未及处理的事情妥善处理好，其中包括不少枪支、弹药的处理。我按罗亦农的要求，迅速把中央没有来得及带走的东西秘密转移保存起来；枪支、弹药转移不便，就在附近挖地深埋。我至今还记得上海交大物理实验室的地下就埋了5支马枪与一些子弹。任务完成后，我也

赶到了武汉。

四一二政变后，党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1927年4月27日，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召开的五届一中全会正式决定组建中央军委。我到武汉时，也正是中央军委成立的时候。周恩来任中央军委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王一飞任秘书长，徐以新任秘书。军委下设两个科，即组织科和特科，欧阳钦任组织科长，顾顺章兼特科科长，我担任了特科下设的特务股的股长。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又公开背叛革命。8月1日，党中央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终因敌强我弱，南下广东的起义军不久即告失败，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罗亦农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我们采取了各种方式与国民党右派斗争。那时，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很猖狂，常常组织人当众演讲，宣传反共主张，蛊惑群众。我们化装以后也混在群众之中，在没人注意的时候，就拔出手枪朝天放枪，结果吓得演讲的右派再也不敢讲了。

南昌起义后，党中央从武汉又迁回到上海。我又被留下做善后工作，主要是处理中央办公租借的房子和一些物品。这一工作很快即告结束，我把退房得来的钱物交给地方组织后，于当年10月回到上海。

同月，顾顺章也从武汉来到上海。正当他与老婆张杏华搬家的时候，碰上了一个叛徒。顾顺章已从内部知道此

人叛变了革命，而这个叛徒却以为我们并不知情，还想继续招摇撞骗。顾顺章把他骗到家中喝酒，让张杏华赶紧来找我报信。我急忙带上手枪、斧子、豆腐皮赶到顾家在门外守候。当叛徒醉醺醺地走到门口时，我们里应外合，一齐上去陷住他的脖子，将一卷豆腐皮塞进他的嘴中，他连哼都没有来得及哼一声，就被我们干掉了。当时对叛徒是绝不能心慈手软的，否则，他就会出卖同志，出卖组织，给革命带来严重的危害。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建立和健全了党的中央机构。根据形势的发展与地下斗争的需要，组建了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参加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领导，仍由顾顺章兼科长，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科，我任交通科长。

行动科在内部也叫“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打叛徒，清除隐患。叛徒是我们地下斗争中最危险的敌人，所以我们决不宽容他们。当时以及后来的如白鑫出卖彭湃，范梦菊出卖向忠发，顾顺章出卖恽代英，都是典型的例子。

白鑫原是叶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营的党代表，后来到上海中央军委机关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为乞讨活命，竟主动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告密。为掩人耳目，他与特务串通，乘彭湃出席会议之际，让人把他与彭湃一起抓走，演了一场苦肉计。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以及中央军委负责士兵运动的邢士贞

等。彭湃等被捕后，周恩来心急如焚，当 he 从内线了解到敌人要转解彭湃的确切消息后，便立即亲自组织力量营救。他还指示说：“凡是会打枪的都去！”因为我的枪法不错，所以也被列入人选。但因拟用于这次行动的枪械还涂着防锈的黄油，必须擦净后才能使用。等我们赶到行动现场时，押解的囚车已经过去。

彭湃等同志牺牲后，我们千方百计要除掉白鑫这个可恶的叛徒。在内线的配合下，终于在不久后给了这个叛徒以应有的惩罚。

1928年6月至7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由于国内环境的恶劣和斗争的需要，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未能出席会议，周恩来出席并领导这次大会。六大之后，根据苏联同志的建议，我党开始在上海着手建立无线电通讯设施。因为我们以往仅靠人员往来传递消息，速度慢，而且不安全。如果通信人员途中遇到麻烦，还有泄密的危险。这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

一天，周恩来把我找去谈话，要求我进行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研制。我听后有些为难，因为我虽然上过大学，但对无线电却一窍不通；而且，反动派对无线电设备控制很严，书店也根本没有与此有关的中文书籍。周恩来鼓励我说：没有中文的书，可以看英文的，你的英文基础不错，完全可以自学。在周恩来的信任与鼓励下，我当即表示，既然中央已经决定搞无线电，又把任务交给了我，那我就边学边干，全力以赴。与此同进，军委将特科的四科改为无

线电通讯科，仍由我担任科长。

接受了周恩来亲自交代的任务后，我立即开始了工作。先是到书店里买回不少美国出版的英文无线电专业书籍，进行系统的自学。然后是摸索、实践。那时的上海博物院路有一家私营的大华仪器公司，专门生产大型收发报机，我通过关系，设法把产品弄出来，一面解剖，一面研究。这样，慢慢摸到了门道，心里有了底。最后是制作。一般的零件在市面上能买到，但重要的部件却很难买到。我们就利用一些外国人办的洋行，在那里定货取货。可是象紫铜管绕的线圈，洋行里也买不到，就只有靠自己做。

在购买零件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大华公司的职员郑国年。郑原是南京号邮轮上的一名报务员，到大华后，专门负责为各轮船上的小型无线电台提供零配件的买卖。在他的帮助下，有时让我安装，有时让我修理，还供给了我不少所需的零部件。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还教会了我如何绕线圈。当时沪东有恒路上有一家兆敦公司。是共产党员蔡叔厚开办的，专营变压器。我设法弄来了几部机床，其中有刨床、钻床、车床，并在蔡叔厚的公司里找了间屋子，自制了一些无线电零件。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第一批无线电台终于研制出来了。但效果究竟怎么样，我的心里也没有底。正好张沈川曾学习过无线电收发报，于是就请他来操作、检验。张沈川先从抄收国民党电台的国际新闻与气象预报开始，然后再与世界各国的业余无线电台联系通报，结果证明我们

自制的无线电台完全符合要求，可以投入使用。从此，我们党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张沈川也成了我党最早的无线电专业人员之一。

1929年9月底，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党中央派我到香港建立电台。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先后去了两次。

第一次是我一个人去的，目的是选地点和房子，既要利于隐蔽，又要便于工作。结果选中了在九龙弥敦道的一所房子。当地组织为我们物色了一个朝鲜人作报务员；还派了会说本地话的卢彪夫妇住下来作掩护。一切安顿好后，我便启程返回上海。

到了年底，我第二次去香港，同行的有黄尚英。我们随身携带着收发报机。海关检查时，我们早有准备，把事先预备的银圆往警察手中悄悄一塞，他心领神会，在我们的箱子上用粉笔做一个记号，看都不看，就放我们过关。也许，他把我们当成了一般的走私者了。

在香港安装电台要比在上海安全，一方面是因为英国人管理不象国民党那么严；另一方面是香港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比较多，当局也管不过来。黄尚英试着发了几天报，讯号很稳定。接着，我们就按约定的时间、呼号与频率，和上海党中央的电台联系，相互通报。因为工作辛苦，生活条件差，黄尚英得了肺病。那时的肺病是不治之症，黄尚英不得不返回上海，不久就病死于回浙江家乡的途中。他去世时，年仅20岁。对于这位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在我党无线电事业中第一位以身殉职的同志，我一直深深怀念

着他。

1929年10月的一天，邓小平到了香港，找到了我，询问了有关电台的情况。当时小平同志正奉党中央的指示去广西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有了香港这部电台，就可以及时将起义的消息与情况经香港报中央。此外，邓小平同志的妻子张希远当时已经牺牲，他托我回上海后帮助安葬。12月11日，邓小平、雷经天、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起义取得成功，消息经香港电台很快转报给在上海的党中央，这对大家也是个极大的鼓舞。不久，我回上海后，立刻遵小平同志之嘱把张希远的遗体安葬在上海公墓，墓碑上还写着立碑人的名字：曾幼范。

1930年12月，香港的电台遭到破坏。当时曾三是上海中央电台的报务员，17日他突然收到一份香港发来的明码电报。我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一位英国朋友发来的，告诉我们电台已被英国当局查获；报务员被捕，但处境尚好。我马上把情况报告给中央，并立即通知与香港停止联络。香港的电台尽管只工作了不到1年，但它做了不少工作，起了不小的作用。半年之后，我们的报务员也被放了出来，因为他们没有抓到多少把柄。

也是在1930年12月，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的江西苏区红军在龙岗战斗中俘虏了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1931年初，张的亲属来找我们，说只要我们放人，他们可以拿枪支弹药来交换。那时，红军的枪支弹药非常缺乏，很需要得到补充。我们的电台还不能与江西苏区通报。

周恩来决定派龚饮冰、涂作潮与张的亲属一起赶往江西谈判。然而他俩刚到南昌，就听说张辉瓒已被红军处决，只好中途返回了上海。这一事件也说明在党中央与苏区间建立电台联系是何等的必要。

1931年春，伍云甫、曾三和涂作潮带着我们自制的50瓦小功率电台，由上海经福建长汀到达江西瑞金。行前，聂荣臻专门找他们谈了话，强调了党中央与江西苏区联络的重要性。后来，电台是送到了，但由于功率小，远距离通讯效果不好，上海方面收不到。怎么办呢？5月，正好红一方面军与国民党二十六军公秉藩部作战，知道他们有一部100瓦大功率的电台。于是，打仗前，我们就派人进行了侦察，告诉部队作战时保护电台，而且一定要打胜。结果一切如愿，我们打败了敌军，完好地缴获了这部电台。曾三便利用这部电台发报，与上海党中央取得了联系。由于有了这部大功率电台，组织上才派王诤负责组建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电台大队，并由他担任大队长。从此，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开始有了电讯联络。

1930年3月，党中央曾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军委特科指定由我负责。训练班采用分散居住、登门教学的秘密方式进行，学员来自各个苏区。张沈川与我担任教员。学员们经历不同，文化程度不一，我们便采取因材施教，从实际出发的方针。学员们学习非常刻苦，专心致志，两三个月后全部结业，走上工作岗位。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党我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骨干。